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 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Education in the Ordinary Life:
the Study of Tsa-tz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顾月琴/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 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Education in the Ordinary Life:
the Study of Tsa-tz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顾月琴/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 顾月琴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6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4554-0

I. ①日… II. ①顾… III. ①汉字—异体字—研究—
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H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701 号

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著 者：顾月琴

出版人：朱 庆

终审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赵 锐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8（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zhaorui@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690×975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9.75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554-0

定 价：49.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思想古已有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教育一般是贵族的特权，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与文化底蕴。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后，学优则仕便成为普遍法则，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更成为士子读书进仕的法定教科书。他们希冀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封建社会的主流阶层，因此往往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文化，重人文政务而轻自然科学及技能技艺的学习，导致中国古代农工商等实科教育不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辟土殖谷的农民，作巧成器的百工，通财鬻货的商人，为应对写信记账等生活需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愿望与可能。而科举竞争的激烈，产生了大量的落第文人，这些受过精英教育的落榜者由雅入俗，与市井中人同流，冲破儒家思想约束，编写了大量的杂字教材。这类杂字是我国古代流传在民间与“三百千”并行的识字教材，一般句式短小，语言通俗浅显，内容简单实用。与儒家经典注重修齐治平鄙视工商的思想不同，杂字较少引证古代圣贤言论，除介绍人情世故及自然科学外，还大胆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商业经验、百工技艺等实科内容，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融为一体，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百科全书，促进了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发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杂字成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以来“经学”传统的背叛，元代政府甚至明令限制乡塾使用“杂字”教学，似可作为历代统治者对其抱有偏见的旁证。但由于杂字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迎合百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的观念，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增多，内容也日益丰富，它的读者不限年龄，不拘身份，成为当时中下层百姓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发展到明清时期，杂字已逐渐突破识字教材的功能，成为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由此，儒家精英教育与杂字大众



教育相结合，满足了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中国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使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所不在的力量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及教育的普及。杂字非但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而且还被少数民族学习采纳，出现了少数民族杂字。杂字甚至还跨洋越海，远播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作为中国民间俗文化的一部分，杂字在中国教育史及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功不可没！

本书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追溯杂字从古至今的历史轨迹，力求透析商品经济发展下，明清杂字盛行原因及其特点，并寻求杂字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张力，以期为当今中国的教材改革、扫盲教育及农村教育提供借鉴作用。全书包括正文和结语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论述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对明清识字教材进行总体分析。

第二章主要追溯了杂字的历史轨迹。杂字作为书名起源较早，远在汉魏时代已有所见，《隋书·经籍志》就著录多种杂字，但这批早期杂字多已亡佚。宋以后识字课本丰富多样，杂字也成为当时百姓子弟农闲时接受教育的常用教材。明清时期杂字获得长足发展，其种类渐趋繁多，内容也日益丰富。民国期间新学兴起但依然有百姓使用杂字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扫盲教育全国各地也编写了多种杂字教材。

第三章讨论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乡生活的变迁，人们日常经济生活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科举竞争的加剧，“弃儒经商”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市民阶层的壮大，激发了市民阶层主体本身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他们对通俗娱乐的需求，包括对读物的需求日渐明显。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杂字的刊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明清时期私塾教育极大发展，杂字也被大量用作补充教材。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渐趋增多，内容日益丰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四章系统分析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传统蒙学教材注重灌输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两宋后受理学思想影响，许多蒙学教材更多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杂字教法灵活，内容多为日常事物名称及农工商等实科知识，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多用方言口语，通俗易懂，有的还蕴含敦亲睦族、勤俭节约、惜时上进、反对迷信等思想教化，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职业教育与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实用价值，大大便利和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促进了我国古代民间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五章研究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包括中原西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及台湾、日本等地区或国家的杂字，介绍了与杂字类似的明清商业书，分析了杂字与传统识字教材“三百千”的异同。民国期间新式学堂普遍建立但杂字依然为百姓所接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农村扫盲教育，全国编写了各类杂字教材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些都体现出杂字对后世教育的深远影响。

该书结语部分指出杂字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它不仅是民间识字课本，更是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杂字与儒家经典命运迥异，虽然没有受到封建统治者应有的重视，但对普及我国大众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民国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2

一、选题缘由 / 2

二、研究意义 / 4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8

一、国内研究 / 8

二、国外研究 /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10

第四节 明清识字教材总体分析 / 12

第二章 杂字的历史轨迹 / 14

第一节 起源：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蒙学识字教材与字书 / 15

一、早期蒙学识字教材与杂字的渊源关系 / 15

二、早期以杂字命名的各类字书 / 22

第二节 发展：隋唐宋元时期的各种杂字 / 27

一、敦煌文献中的各类杂字 / 27

二、宋元时期的杂字教材 / 33

第三节 高潮：明清时期的各类杂字 / 37

一、分类编排的杂字 / 38

二、不设类目的杂字 / 45

三、图文对照杂字 / 49



四、释义杂字 / 51

五、地方杂字 / 52

第四节 承继：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杂字 / 55

一、民国时期的各类杂字 / 55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杂字教材 / 58

第三章 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流行的原因 / 61

第一节 商品经济发展与城乡生活的变迁 / 61

一、农村经济生活的变化 / 63

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 / 68

第二节 价值观念转变与市民阶层的壮大 / 73

一、价值观念的转变 / 74

二、科举竞争的加剧 / 77

三、市民阶层的壮大 / 81

第三节 印刷术的改进推广与书坊的发达 / 84

一、北宋印刷术的改进 / 84

二、明代印刷技术和刻书事业的发展 / 87

三、清代坊刻事业的发展 / 89

第四节 明清时期私塾教育的发展 / 93

一、明清私塾的兴盛 / 93

二、私塾杂字教学史料 / 95

第四章 明清时期杂字的特点 / 100

第一节 杂字编者及体例的特殊性 / 101

一、杂字编者的无名性与集体性 / 101

二、杂字体例的多元性与灵活性 / 107

第二节 杂字教育对象及内容的大众化 / 120

一、杂字与农业生产经验 / 121

二、杂字与明清商业教育 / 125

三、杂字与民间百工技艺 / 128

四、杂字与明清人际交往 / 132

五、《妇女杂字》与女子教育 / 137



第三节 杂字中的各类契约与明清民间生活 / 141

一、杂字中土地买卖租赁的契约 / 142

二、杂字中雇工借贷等商业契约 / 143

三、杂字中日常家族生活的契约 / 146

第四节 杂字语言特点及教法的灵活性 / 148

一、杂字语言的通俗地方性 / 148

二、杂字教法的灵活多样性 / 156

第五节 杂字思想教化分析 / 162

一、以农为本, 重视百工 / 163

二、孝悌谦让, 与人为善 / 166

三、禁染恶习, 勤俭持家 / 170

四、惜时进学, 同情弱者 / 174

第五章 明清时期杂字的流播及影响 / 178

第一节 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 / 178

一、中原西北部区域——各周边民族杂字 / 178

二、中原东部传播——台湾地区及日本的杂字 / 188

第二节 商业书的流传 / 200

一、商旅途程、实用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 201

二、商业伦理道德教育 / 207

第三节 杂字与“三百千”的比较 / 210

一、杂字与“三百千”的相同之处 / 211

二、杂字与“三百千”的差异之处 / 221

第四节 明清杂字对后世的影响 / 233

一、承继下的发展: 民国期间杂字特点 / 234

二、发展后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各类杂字扫盲教材 / 243

结 语 / 251

一、水涨船高——杂字与社会变迁的紧密关系 / 251

二、枝繁叶茂——杂字对成人教育的重大贡献 / 255

三、他山之石——杂字对教材改革的借鉴作用 / 258



附 录 / 262

附录一：《七言杂字》 / 262

附录二：《绘图庄农杂字》 / 266

附录三：《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沦陷版） / 273

附录四：《农村杂字》 / 279

参考文献 / 284

后 记 / 303



第一章

导论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识字是重要环节，是读写计算的基础。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①。崔学古在《幼训·识字》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古人指出了识字教学的重要性。而教材是识字教育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自隋唐以来集中识字的教材主要是家喻户晓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另一类是流传于民间的非正规识字教材——杂字。

本书研究重点不是为儒家精英教育作准备并在传统蒙学中占主角地位的“三百千”，而注重流传在民间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杂字教材。这类教材注重日常应用，其用意在于“即物以辩其言，审音以知其字”，为日后写信记账及掌握百工技艺服务，但因杂字较少灌输儒家伦理道德且内容浅显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鄙视，元代统治者甚至还明令禁止乡塾使用杂字进行教学^②。“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古代中国所有读书人追求的理想，科举将这种学优则仕的理论制度化，发展到明清时期，读书人对科举的迷恋达到了狂热程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试题，重人文政务而轻生产

^①（清）王筠：《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稿》本。

^②《大元通制条格》卷五：“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各路府州司县在城关厢已设长学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今后止许遵守已降条画，训以圣经，教其句读音义。学师比及受请以来，宜于州县学官处预将各经校正点读句读音义归一，不致讹舛，如此庶免传习之误。已明经史，不拘此例。仍令府州司县提点农事去时，亦宜学师处处理奖励。大司准拟。”



技艺,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农、工、商子弟入学者增加的实际需要,农工商各业知识和技能逐渐充实进蒙学教材,各种杂字类教材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①,中国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那么明清时期杂字为何会在民间流行?它们与儒家经典有何不同?作为沉默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教育状况如何?杂字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何关系?民国设立新学堂之后杂字的命运又是如何?新中国成立后杂字又何去何从?总之,本书力图通过透析明清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来探讨田夫牧子、贩夫走卒的识字教材——杂字,并为保护这民间文化遗产尽上微薄之力。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选题缘由

1. 杂字——与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教材

“我们的教育研究该如何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或者说,教育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②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教育本身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教育与日常实践的探讨。本研究以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流传在民间的实用教材——杂字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状况。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教育一般是贵族的特权,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后,儒家经典更成为士大夫读书做官的法定教科书。这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的精英教育重人文政务而轻生产技艺。后来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读书的需要与可能,教材与教法相应,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③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迎合百姓需求的识字教材统称为杂字。那么农工商等田夫牧子、贩夫走卒,他们使用的这类杂字教材与儒家经典有何不同?这类杂字教材为何在明清时期盛行?这种教育与百姓日常生活有怎样的互

①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② 丁钢:《教育与日常实践》,《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周谷城:《传统蒙学丛书序》,《传统蒙学书集成》,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动关系?本书主要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明清社会发展变迁中底层百姓的教育状况,分析探讨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民间识字教材——杂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以期为当今中国的扫盲教育、农村教育、成人教育及教材改革提供借鉴作用。

2. 杂字——被误解并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遗产

杂字是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教材,起源较早,远在汉魏时代已有以杂字命名的字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学者给杂字以确切的定义。“杂字”一词,我国《辞海》无条释,而“杂”字据1999年版《辞海》解释共有6条,其中第2条和第3条分别解释为混合、掺杂和聚集的意义。日本《大汉和辞典》收有“杂字”这一词条,将“杂字”解释为“把各种事物名称汇聚在一起的文字”。从笔者掌握的多份杂字教材来看,杂字多为列举日常所见事物名称及传授农工商等经验知识,有的分类编排,有的合辙押韵,有的图文对照,因此它兼有混合、掺杂和聚集的意思。但杂字以底层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语言通俗内容浅显,较少儒家道德灌输,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偏见,元代甚至禁止使用杂字教学,更使杂字名不经传。

因此,虽然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但由于官方编辑出版的书志、书目绝少著录,加上杂字编者又不著姓名和撰写年代,许多珍贵的杂字书在长期流传中已散失,给今天的搜集整理带来巨大困难。笔者除在上海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等古籍部复印到少量资料外,还披沙拣金从浩如烟海的蒙学教材中辑录到几份杂字。此外,为获取更多的原始资料,笔者冒着严寒酷暑几度奔波于上海、苏州、山东、北京、广东等地,在当地古旧市场排沙简金,并据蛛丝马迹的记载走访相关人员,多次历经波折无功而返,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众多师友尤其是北师大徐勇老师及中央教科所离休干部张田若老师的无私帮助和笔者的不懈努力下,现已获得相当数量的原始资料。尽管许多杂字都藏匿在沾满灰尘的故纸堆中,翻检出时都已虫迹斑斑甚至破烂不堪,但都无损于其在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甚为痛惜的是,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科学的进步,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化遭遇严重的挑战,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杂字教材也未能幸免。笔者费劲艰辛力图收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各类杂字教材,甘为保护这具有历史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民间文化遗产添砖加瓦。



二、研究意义

1. 历史意义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人类冥冥之中往往有寻根的愿望，回顾以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对于教育而言，更是如此，“我们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只有经历一个自觉的批判、深刻的反思，认真而审慎地选择和接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才能变得更为成熟，更加完善，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①

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里，明清史研究是百花园中最瑰丽的一枝奇葩，近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相关的著作及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纵观民国初年至今的各种明清史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明清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而较少涉及明清的教育与文化。即使是关于教育的著作或论文，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聚焦于官方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相对忽视教育产生的基础，对普通民众教育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丁钢教授此前更是指出：“对于教育研究来说，我们不仅应看到上层、官办的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必须注意到下层民间的教育对于文化传递与变迁的实际作用。”^②“如果我们想仅从学校教育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何以旧的文化思想会那样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及精神观念”^③。顾明远教授也曾指出：“研究一种教育，必须研究产生它的文化基础……只有研究影响某种教育的文化因素，才能理解某种教育的本质。”^④这就为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然而遗憾的是，从当今教育的研究来看，关注较多的是汉民族、发达地区、城市的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村的教育研究较少；而对传统教育的研究偏重汉民族统治阶级的教育，民间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的教育研究很不充分”^⑤。

无疑，官方教育是培养精英人才的摇篮，那些通过科举金榜题名的天之骄子确实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然而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是如

① 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和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② 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和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③ 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和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④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基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14 页。

⑤ 丁钢主编：《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96 页。



何接受教育的？他们所用的识字教材与官府承认的识字教材有何不同？这些教材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上，流行于民间的非官方编集的世俗教材历来被忽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要归于封建正统意识的偏见。然而现在人们开始抛弃偏见，他们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同时也逐渐认识到流传在下层劳动群众之间的作品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性，甚至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时是某些正统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其蕴含的社会意义更能发人深思。

周谷城先生 1985 年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作序时说，“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今存《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也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①

那么在明清这个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特殊时期，这些大多由市井中人、乡村塾师编写的民间教材为什么会流行？普通民众对教育的要求是否跟社会变迁有关？这些民间杂字教材具有什么特点？它们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截止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尚未见到系统论述民间杂字教材的论著，而正是这些名不经传为统治者所鄙视的民间教材，反映的却是时代发展与教育变化。“关于下层民间的社会性文化教育，也应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早在 20 世纪初，英国教育家萨德勒就曾认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对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决定教育的各种因素。美国的 Jerome Bruner 教授也明确指出：教育并不只是传统学校里的那些玩意而已了，譬如课程、标准或测验之属。我们在学校里所应该做的究竟是什么，只当放在更广大的脉络中，来思考社会对于年轻人所挹注的教育投资到底

① 周谷城：《〈传统蒙学丛书〉序》，喻岳衡主编：《传统蒙学书集成》，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② 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我们才能据以理解。^①因此上述问题都亟待我们做出理论上的分析。

2. 现实意义

一方面,杂字依然与农村教育、成人扫盲教育、职业教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80%的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率高居90%以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为改变这一状况,曾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决议、政策、法规来指导和推动农村的扫盲工作,在50年代中后期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农村扫盲运动。为配合这项农村扫盲教育运动,让广大农民都有识字能力,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编写了大量的杂字教材,如萧征于1958年编写《绘图农村日用七言杂字》,张雪庵于1956年编写《口语杂字》,辛安亭于1957年编写《农村日用杂字》,益群于1964年编写《农民杂字四字经》,萧从方、刘毅然于1964年编写《农村四言常用字》,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编辑《新编捷径杂字》,人民教育出版社张田若等于1964年编辑了《农村杂字》,江阴县文教局教研室于1966年编辑《农村常用杂字》等,通过学习这些简单易懂的杂字教材,农民的识字率有所提高,农村扫盲运动取得了较为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后,扫盲教育被重新放置在重要地位,此时也出现专为农民编写的各类杂字,如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编写《农村四言杂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修改重版《农村杂字》,朱起于1983年编写《新编绘图庄农杂字》,吕世圣于1983年编写《新编农村日用杂字》,苗福岭于1985年编写《农用杂字》等。虽然经过全国上下努力,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幅度下降,2000年基本实现“两基”,但总体而言,文盲绝对数仍然很高,而且事实上农村辍学现象仍很严重,新文盲不断产生,农村有些地区人口素质仍然低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农村教育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及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养。而明清杂字教材具有“通俗;结合特定对象的生活实际,注重日常应用;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乡土风味”等特点,因而张志公先生指出:“如果抓住它(杂字)上述的三个特点,用整齐韵语这个方法(当然首先要确定

^① (美) Jerome Bruner 著,宋文里译:《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7~18页。



正确的内容),在成人扫盲或者成人业余补习教育中适当加以运用,未始不是可以试验的一途。”^①

另一方面,杂字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教材编写具有借鉴作用。进入21世纪后,我国正面临着基础教育的艰巨任务,教材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体系,反映了学科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又是课程的具体化形式,体现了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学习内容。那么教材应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这些问题已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在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之际,就有学者提出教材要“增加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学习内容,尤其是联系学生生活、社会实际、现代化技术和生产实际的学习内容,从而在宏观上进一步扩大知识面,拓展学习广度”^②等项建议。虽然教材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功能都在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但总体而言教材的知识性、思想性功能并没有减弱,而目前中小学教材越益强调与学生生活及社会实际的联系,更加突出其实用性。就如叶澜教授在谈论现代型学校特质时所指出的“首先在教育对象与目标方面的重心下移”,“其次是教学内容方面的重心下移”,“教学内容移向关注学科领域与生活领域、社会职业世界的沟通”。^③其中如苏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课本在讲线“平行和相交”知识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要从大街边上把自然水管接到小明家,怎样接比较合适?”^④这就将比较抽象的数学知识引入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明清杂字教材对于今天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只是一种历史遗物,但杂字能在当时不被官方认定的困境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其教材编纂思想及特点为我们当前教材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意义,尤其是杂字作者有意将识字教育与日用常识、生产知识相结合,边学边用,这对改革以往旧教材的诸多弊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有些地方性杂字也对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有着参考价值。

在生活节奏加快并对知识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如何解决那些新文盲的识字问题?如何让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内容、形式、结构和布局诸方面适合农村自己的发展模式?如何让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下的教材更贴近学生生活使他们学有所用?在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大力提倡西部开发、进行新基础教育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② 任长松:《走向新课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③ 叶澜:《实现转型: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7期。

④ 孙丽谷、王林主编:《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教科书·数学》(四年级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